

導言

加強同非洲國家的團結合作始終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基石。

—— 2009年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見
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 (Jacob Zuma) 時的講話

中國領導人總是將本國稱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非洲稱之為「擁有最多發展中國家的大陸」。然而，中國已經很難算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而非洲也並非鐵板一塊的政治實體。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實力在最近十年間持續增長有目共睹，但其驚人的崛起過程尚未完結，對整個世界會產生什麼影響也仍未可知。與此同時，不斷上漲的商品價格給非洲精英帶來了新財富，保持「穩定」在許多非洲國家成為獨裁者的座右箴言。隨着中國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漸增，其保衛自身利益的行動也愈來愈影響國際社會的利益。在與周邊鄰國以外，中國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關係，大概都不會像中非關係這樣引人注目。中國與非洲的日益密切往來，不僅關係到非洲大陸今後幾十年的繁榮與穩定，也將對國際體系產生影響。

本書探索中非關係在現代中國的發展，即1911年至2011年間，主要聚焦在1949年後的時期。我們特別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非洲國家交往的目標與使用的方法，涉及從武器貿易到教育交流的一系列廣泛議題。我們旨在對中國與非洲所有54個國家的關係作全面分析，以供學界、媒體、商界和政府決策層參考。誠然，此類研究最大的困難是提煉出能站得住腳的總括性結論，這對於高度多樣化的非洲殊為不易，各種例外和特殊情況比比皆是，需作進一步具體分析。因此，本書以整個非洲大陸為背景，對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分別作個案考察，對其中涉及的每個具體議題均作細緻入微的分析。本書可用作研究參考、大學教材，政府、私人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的行動指引，也可作為非專業人士和有關議題長期觀察者的讀物。

本書是五年深入研究之後的成果，旨在全面解讀中國與非洲各國政府間的關係及這一關係的迅速發展。我們最初的目標，是從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等方面調查研究最近十年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但顯然地隨着研究的推展，我們意識到要對主導當今傳媒報道和各種論戰的中非關係作全面檢視，就有必要闡述中國與非洲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

為了深挖歷史，我們依靠上一代中非關係資深研究者的成果，包括于子橋(George T. Yu)、布魯斯·拉金(Bruce Larkin)和阿拉巴·奧貢桑沃(Alaba Ogunsanwo)。¹我們還大量使用了新聞報道、政府報告、學術論文、解密文件、智庫和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報告，以及現場訪談的資料。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走訪了九個非洲國家，²到訪中國六次，訪談中非社會各界各階層人士四百餘人。受訪者有在蘇丹工作的中國挖掘機手，在廣州打拼的西非紡織品商販，中國駐幾個非洲國家的大使，台灣當局駐斯威士蘭(台譯：史瓦帝尼，Eswatini)的大

使，以及非洲國家的諸多駐華使節。至於中、非之外的第三國人士，包括在非洲的外資石油公司管理人員，美國負責非洲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日本駐埃及大使，葡萄牙總理府辦公廳主任，以及多位歐洲議會議員和歐盟委員會高官。在上述訪談中，我們得益於我們掌握的中文和法語，並參閱用這兩種語言寫成的文件。

中非關係的關鍵議題和歷史趨勢

我們在寫作本書時，歸納出九項中國與非洲國家關係的關鍵議題及其歷史發展趨勢。為便於讀者閱讀，以下先作簡單總結，排序先後無特別含義。

中國主導關係

從明朝鄭和下西洋開始至今，基本上一直都是中國引領着中非關係的議程。³最近幾十年間，隨着國力的增長，中國更是能主導雙方關係的發展進程。在中國與非洲國家經貿平等往來的套話背後，是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2010年為10.1萬億美元）讓任何一個非洲國家都相形見绌，包括發達如南非這樣的國家（2010年為5,240億美元）。⁴中國的人口逾13億，而全部54個非洲國家加起來的人口也不過10億，其中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亞，也就1.5億人。以美元價值計算，2008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比所有54個非洲國家加起來還要多出兩倍半。中國引領中非關係議程的能力，亦有賴於其縱橫捭闔於整個非洲大陸的通盤設計，由2000年開始的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 African Cooperation, FOCAC）框架創立並固定下來。

中國佔據壓倒性優勢的經濟規模以及在大多數勞工和資本密集型生產上的比較優勢，使得產自中國的低成本商品大量充斥許多非洲國家的市場，由此在一些地方引發對中國貨的抵制。對每個非洲國家而言，能否從其與中國獨特的雙邊關係中長期獲益，取決於其是否有足夠手段來解決與中國的貿易爭端，以及其與中國超強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周旋的能力。

中國的「一盤棋」策略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北京一直以國家主導的模式來處理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中國早年主要是提供適量援助，與非洲貿易額很小，直接投資則幾近於無。在這一時期，雙邊關係主要強調高層互訪、文化交流、提供獎學金，以及金額有限的技術援助等。儘管當年這些交流項目的規模遠比今天的小，但其由國家控制的格局至今未變。然而，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與日俱增，造成對多數非洲國家的援助、貿易和投資不斷增加。隨着政府主導的對非援助和經貿往來持續擴大，在非洲從事橋樑、水利設施、公路和鐵路建設的中國國有企業也日漸增多。在中國的協助下，一些非洲國家建設經貿合作區，入駐其中的中國企業可享受稅收和投資政策優惠。⁵

中國目前與西方國家在非洲展開了全方位的競爭，並在大多數領域佔據上風。中國對非洲多管齊下的政策已見成效。2009年，中國力壓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軍工企業正成為對非軍援的重要來源；新華社在非洲的分支機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通訊社都多；每年中國的大學和培訓機構接待數以千計的非洲學員；在非洲的孔子學院有28所；⁶另外還有類似「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 的志願者援助機構，只是規模相對較小。⁷雖然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仍在西方國家之後，但增長迅速。如果還要懷疑中國在非洲是否有「一盤棋」戰略，最好去閱讀中國在2006年發表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

不存在「中國發展模式」

儘管中國有對非洲的戰略，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在推動什麼特別的發展模式。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30年一直保持着高達10%的GDP年增長率，吸引了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他們希望在自己國家看到類似的奇跡。中國模式的某些方面也許可以複製到某些非洲國家，但要實現全盤輸入中國發展模式的目標卻是不切實際的，要達到中國式的增長速度最終也只是個競選口號。非洲和西方的理想主義者常用一些浪漫的詞句來描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比如所謂「北京共識」，卻完全忽視了中國與非洲之間的巨大差異。這些被忽視的變數，包括人口規模、政治體制、殖民地歷史、國家強權、宗教信仰、儲蓄比率、海外華人社群等。相形之下，倒是中國人自己常常對削足適履地套用「中國模式」付之一哂，以過來人的身份忠告各國應充分考慮自身國情。

台灣問題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北京已經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財力，以期終止非洲國家對台灣的外交承認。對於非洲國家（其實對美國、日本抑或其他國家也是一樣）來說，只有它們願意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絕官方關係，北京才能與其建立外交關

係。過去曾有幾個非洲國家利用中國在這方面的堅決立場，在北京和台北之間來回切換外交承認，以坐收來自兩岸競相加碼的慷慨饋贈。2007年底，馬拉維成為最近的一個改換外交承認的非洲國家，從台北投向北京的懷抱。2008年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後不久，兩岸達成了「外交休兵」的非正式約定，當時僅有四個非洲國家承認中華民國，分別是布基納法索、斯威士蘭、岡比亞、聖多美和普林西比。⁸

多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多數外交努力都是不動聲色在幕後進行，只有少數是公開的。北京封殺台灣的官式外交存在，並不是從商業利益着眼。但是，當台灣在非洲國家首都設立商貿代表處的時候——比如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其所具有的官方含義就超出了北京所願意接受的程度。最終中國動用的外交手段也只是籲請尼日利亞政府敦促該代表處搬至拉各斯或其他城市。這表明，對於一些重要的非洲國家，北京可以容忍台灣在其商業中心城市有半官方性質的存在。

更加密切的政治關係

一些非洲國家實行多黨制，反對黨並非形式，工會力量相當強大，非政府組織數量眾多，公民社會活躍發聲。這些圖景在中國都是不存在的。中國對這些角色的理解歷來頗感困難，同時還要努力應對非洲對中國對內及對外的政策和勞工關係的批評。不過，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克服這些分歧，例如加強與非洲政黨、議會代表團、幹部官員以及文化團體、教育機構的交流。最近中國的外交接觸，甚至擴展至一些慎重挑選出來的反對黨、非政府組織以至公民社會。非洲的工會組織和人權活躍分子對中國政府而言仍是一個重

大挑戰，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的利益總體上與中國國有企業有衝突。

從支持革命到實用主義

中國對非洲的態度，從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主要是支持民族解放和革命運動，轉至1970年代中期後採用更為實用主義的態度。隨着中蘇關係破裂和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國在非洲的政策目標也相應調整：起初是反對蘇聯霸權，後來轉變為支持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漸進過程。對於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大批剛脫離殖民統治獨立的新生非洲國家，中國以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它們接觸。然而，在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和非洲的左派都推動更加「革命」的議程。到1970年代末鄧小平上台掌權，中非關係進入了以穩定和可預測為鮮明特徵的新時期。某程度上，這種變化早在毛澤東去世前後已經開始，但這個朝向實用主義發展的過程整體來說是漸進的，並隨着中非雙方國內的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蘇聯威脅態勢的發展而演變。

到了1990年代，中國對非政策已完全為實用主義主導，特別是經濟關係。自「中非合作論壇」(FOCAC)在2000年成立以來，中國和非洲在此合作框架下進行了廣泛的經濟和政治互動。除了非洲國家各政府，在江澤民提出「走出去」戰略旗號之下，中國從中央到省級的眾多機構和企業也都參與其中，影響了當代中非雙邊關係發展的軌跡。⁹

快速易轍

儘管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因為與非洲的革命運動關係密切而著稱，它同時也與一些右傾的非洲獨立國家發展關係。中國分別在1958年同保守的摩洛哥君主政權、在1963年同肯尼亞的中間派政府、在1964年同突尼斯的保守派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在整個1960年代，中國克盡艱難與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政權發展關係，兩國最終於1970年建交。¹⁰不過，自1970年代中期之後，北京已表現出熟諳於如何與各類非洲國家政權打交道，以促進自身利益，擠壓台灣的外交空間。一直以來，中國對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執行支持現政權的政策，無論它是民主政體、君主王朝、獨裁專制，抑或是軍政府或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中國同任何能控制國家權力的政府都勉力維持親近關係，但一旦發生政權更迭，中國也能輕車熟路地很快同繼任的新政權建立同樣親近的關係。

由於國內並不存在壓力集團和議會制肘，中國的一黨執政體制使其可以迅速與非洲國家新政權建立關係。即便與前執政黨關係密切，中國也可以輕鬆移情別戀。北京曾支持過南部非洲地區的幾個解放運動組織，但在它們失敗後，很快就向取勝的對手伸出橄欖枝。例如贊比亞，在「多黨民主運動」(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贏得1991年大選後，中國就棄聯合民族獨立黨(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轉而與執政黨政府發展關係。¹¹到了2011年，贊比亞反對黨候選人贏得總統選舉後，中國只能再次改弦易轍。¹²近年來，依仗不斷壯大的經濟實力，中國對非洲國家新政權越來越多地使用經貿「胡蘿蔔」加「大棒」，這也使其很容易在更迭政權中轉圈。非洲國家新上台的領導人，面臨棘手的治國難

題，迫切需要中國的幫助，因此也就很少糾結於中國曾支持其政治對手的過往。

中國的軍事存在不斷凸顯

中國沒有與任何非洲國家結成軍事同盟，在非洲沒有軍事基地，並聲稱對這兩點均無訴求。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與非洲接觸伊始，就有選擇地向一些奉行民族主義和革命理念的組織出售或贈予小型武器。隨着中國對非政策的實用主義化，解放軍和中國軍工企業也抓住了非洲帶來的機遇。例如，在1990年代末的厄立特里亞與埃塞俄比亞戰爭期間，中國同時對交戰雙方都出售軍事裝備；蘇丹政府得到了中國提供的武裝直升機，用於鎮壓南蘇丹和達爾富爾地區的反對派；中國還向津巴布韋的穆加貝專制政權出售數百萬美元的武器彈藥；2011年，中國向利比亞卡達菲政權提供價值兩億美元的武器，供其與北約和反政府武裝作戰。中國現在是全球製造大國，也是地區軍事強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大量廉價的中國製輕型武器總是有辦法能源源不斷地運到非洲國家軍隊和反政府武裝手裏。

中國解放軍海軍已經開始致力保衛從非洲和中東地區到中國運送石油、礦產和原材料的遠洋航道，惹人質疑中國海軍是否會在非洲尋求港口。來到非洲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不免會捲入當地衝突，有時還會成為有預謀的襲擊目標，這些已經在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蘇丹、埃塞俄比亞和利比亞發生。在最近十年，出於對安全問題的關切，中國不得不重新審視與非洲國家的軍事合作。中國已經成為聯合國在非洲維持和平方動的主要參與者，中國海軍也對在亞丁灣打擊海盜行動作出了貢獻。

非洲華人群體的壯大

目前在非洲的華人群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專業人員，包括使領館工作人員、援外專家、大企業職員和項目經理人員。這類人員通常舉家前來，能使用至少一種當地通行語言，和其他外國人士一樣居住在國際社區。他們最終幾乎全部回到中國，或是在任期結束後轉赴他國開始新的任期。第二類是數以萬計的勞務輸出合同工，他們通常是隻身前來，幾乎不會說當地語言，和其他中國人扎堆聚居，在合同期滿後返回中國。第三類是從事貿易的小商人。有些人早在一個世紀前移居南非、馬達加斯加和毛里求斯等地，但大多數中國內地商人都是新移民，且大多是攜家眷前來。他們通常和非洲當地人混居，掌握一定程度的當地語言，足夠做生意。他們當中有人不會回國，可能因為生意利潤、安全條件、家庭紐帶和商業聯繫的變化而在非洲大陸遷徙。

有些非洲人對中國工人的怨懟與日俱增，因為他們認為正是這些中國人搶走了本屬於本地人的工作機會。某些非洲本地商販也對他們的中國籍同行抱有同樣情緒。這在南部非洲表現得尤為突出，因中國商人的商品價格便宜，能直接從中國本土的廠家進貨，而且願意加班工作，這些優勢都正在把本地商人和廠家擠出市場。另一方面，非洲消費者通常樂見中國商家帶來的競爭和他們負擔得起的貨品。

中非關係的學術研究

在中國與發展中世界的關係中，非洲可以說是在中國鄰國之外最為重要的。在過去十年，有關中國與亞洲國家和西方世界關係的

學術文獻顯著增加，但有關中國在非洲利益和對非政策的論著卻一直寥寥。僅有數十名研究者經常發表這個範疇的成果，其中也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可稱為中非關係問題專家，他們大多住在美國之外。相形之下，前輩學人中倒還有幾位美國的政治學大家。大體來說，美國學術界放棄了中非關係問題研究近30年。我們希望本書能成為喚醒美國學術機構復興中非關係研究的開端。本書也是自布魯斯·拉金 (Bruce D. Larkin) 的著作《中國與非洲：1940-1970》之後，美國學界在這個領域的首部全面性專著。¹³

從歷史的角度審視，過去多年美國對中非關係問題關注式微，是可以理解的。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國在毛澤東所稱的「第三世界」身陷戰略和意識形態爭奪戰，當年中非關係在西方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重視。¹⁴僅在1963年至1966年間，至少有四本關於中國對非外交政策的專著，都用類似《紅色中國的非洲攻勢》為題以作招徠。¹⁵在1974年至1976年間，至少有五本書以及無數的論文，討論中國和整個非洲大陸的關係。¹⁶其他還有一些論及中國在拉美、中東和東南亞角色的研究。¹⁷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由於中國的注意力主要在國內，它在非洲的角色被認為不像以前那樣同美國針鋒相對，美國的專家學者對中非關係的研究由此減少。

當代文獻

儘管普遍認為中國對非洲的興趣大多與資源有關，但資源對中非關係到底有多重要，以及從更大的意義上說，與資源有關的目標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在非洲長期的雄心和謀略，可謂莫衷一是。

在非洲研究專家中，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新興的政治和經濟夥伴，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的文獻多糾纏於對「華盛頓共識」和所謂「北京共識」進行比較研究。以非自由及威權資本主義為主要特徵的中國模式是否可移植到非洲？如果是，那麼它比自由市場經濟、自由民主政體更適用於非洲的現狀嗎？非洲研究專家在論及中國時通常圍繞着這些話題打轉，儘管中國人自己對「北京共識」這種說法並不以為然。

與此同時，在漢學家群體中，有關中國戰略意圖的討論恆久不絕，已經延伸至中非關係領域。中國正在「再次殖民」非洲嗎？中國是「流氓捐助者」(rogue donor)嗎？¹⁸ 中國的反自由主義對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有害嗎？中國正意圖挑戰美國對國際體系的主導權嗎？如果真是如此，非洲何以自處？總體來看，在過去三四十年間西方非洲研究專家和漢學家關於中非關係的討論，其實已經成為一個子話題，從屬於中國的戰略意圖及其對非洲發展影響這個大議題。

如果不從非洲研究專家和漢學家的角度來看問題，那麼當前大多數關於中非關係的文獻又可歸納為樂觀派和悲觀派之間的激烈交鋒。持樂觀主義觀點的研究者把中國視為對非洲有益的生意夥伴，在政治上既支持各國的進步力量，也不背棄「老朋友」。他們不認為中國與非洲國家間的關係有何理由值得憂慮，而是更多地看到近年來中國對非外交和為非洲所提供的經濟機遇等積極勢頭。

另一方面，那些相對悲觀的觀察家相信中國支持政治專制主義、鼓勵非洲國家擺脫西方發展機構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既然奉行威權主義，則必定對自由民主心懷惡念；他們也認為沒有什麼能遏制中國的野心。¹⁹ 也有人說，政治體制無關宏旨，但認為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很可能會與美國這個霸權國家在非洲或世界上其他

什麼地方發生衝突。²⁰一些漢學家則反駁說，由於受制於國內基礎不牢、及其國際組織成員身份的限制，中國可打的牌並不多，因此不太可能在其勢力範圍之外主動挑起衝突。²¹

樂觀主義者

對中國介入非洲持樂觀看法的，主要是強調中國與國際多邊機構合作、幫助非洲重建信心，以及透明度不斷改善（儘管還處於相當初步的水平）。²²這昭示着一種正面的發展趨勢，即中國與非洲的經濟關係是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支持因地制宜等政治原則的基礎上。此派觀點認為，在與國際組織交往和建構一套與非洲人打交道所用辭令的過程中，中國商界精英和政治決策者的價值觀念受到對方的影響並逐漸接受、內化，其世界觀因此演變。樂觀派列舉出中國已貢獻出的累累碩勳，包括：對蘇丹施加政治壓力，在非洲部署維和部隊；呼籲支持全球公平貿易，增加對外援助，提升非洲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代表權；加強與非洲多邊機構合作，如非洲聯盟、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²³

以上論據將中國描繪成受歡迎的商業夥伴，和可幫助非洲抗衡西方剝削的政治砝碼。中國的參與被視為帶來經濟發展機遇，以及對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進步力量的政治支持來源。喬舒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其名作《北京共識》總結了這樣一個觀點：

中國的發展正在使它發生變化，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的新思想在國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在有一個強大重心的世界上

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這些國家不僅在設法弄清如何發展自己的國家，而且還想知道如何與國際秩序接軌，同時使它們能夠真正實現獨立。我把這種新的動力和發展物理學稱為「北京共識」。²⁴

雷默認為，北京共識「取代了廣受懷疑的華盛頓共識」，後者「是一種以『華盛頓知道得最清楚』的方式告訴別國該如何管理自己的經濟理論，在1990年代曾風靡一時」。雷默提出，通過樂於創新、注重生活質量和經濟增長平衡、提供公平機會以息社會不安、尊重民族自決等一系列新理念，中國正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²⁵

黛博拉·布羅蒂加姆 (Deborah Brautigam) 也着重強調非洲國家受益於同中國的關係，並認為「害怕中國援助和與中國接觸都是被誤導所致，這樣的警告實在是小题大做」。²⁶ 她的著作《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總結：²⁷

時至今日，我們應當銘記於心的是：中國自身的實踐已經使上億中國人在基本沒有外來援助的情況下脫貧。中國人篤信投資、貿易和技術是撬動發展的槓桿，他們也把這些工具運用到與非洲的交往。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在無私助人，而是出於他們在自己國家的經驗。中國人懂得：自然資源可以成為走向現代化和繁榮的有利條件，而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中央政府可以迅速減少貧困。²⁸

沙伯力 (Barry Sautman) 和嚴海蓉認為，中國向非洲提供了頗具吸引力的諸多經濟機遇和政治選擇。他們提出，「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是，中國並沒有阻撓世界較貧窮的國家走發展之路」。²⁹ 正如

歐洲學院教授門鏡指出，中國與非洲「在互利原則基礎上，於經濟、政治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相互幫助」。³⁰ 門鏡、雷默、布羅蒂加姆、沙伯力和嚴海蓉代表了那些學者，他們認為，隨着新商機在中非雙方商人和消費者面前的出現，中國也為非洲國家提供了關鍵性的籌碼，使之得以反抗一直以來都在支配和剝削他們的西方國家。³¹

中國和非洲的研究人員和政治決策者，都對中非經濟關係的前景感到樂觀。³² 他們通常採用路徑依賴 (path-dependent) 的論調，肯定傳統友誼對現今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重要推動作用。例如，在2009年2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沙特阿拉伯和非洲四國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非洲研究室主任徐偉忠研究員說：「胡主席訪非，表明中國政府無論是基於傳統友誼，還是從未來長遠考慮，都高度重視非洲。」³³

中非領導人會見的官方公報總是聲稱「友誼」是雙方關係的重要動力。例如，在2006年11月胡錦濤與幾位非洲國家領導人的一次會見中，胡這樣闡釋中非友誼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中國高度重視傳統友誼，願致力於保持兩國高層友好交往，深化經貿領域的互利合作。」胡會見的非洲國家領袖，包括當年已長期擔任加蓬總統的奧馬爾·邦戈 (Omar Bongo)，該國的石油和鐵礦資源非常豐富。邦戈對胡回應稱「中國是真誠的朋友，兩國人民友誼深厚」，並表示希望繼續擴大雙邊經濟合作關係。³⁴

悲觀主義者

與上述觀點並列的另一派，堅持認為中非經濟關係與政治不自由聯繫在一起，或中國傾向同非洲國家在西方發展機構的影響之外

發展關係。即便他們對於中國介入非洲的動機有分歧，有些認為是中國政策制定者的意圖，有些認為純屬巧合，有些則認為是大國競爭的必然後果，持這些觀點者在與中國介入非洲大陸相關的政治上大都持有懷疑、悲觀的看法。

美國和歐洲的一些政治決策者和研究人員對威權主義的中國深懷疑慮，認為中國一直在力圖「誘惑反自由的專制政權」，把這描繪成對西方「可怕的意識形態挑戰」。他們聲稱，儘管今日中國尚實力有限，但其反自由的傾向已昭然若揭，未來待其國力壯大，必成大患。例如納扎寧·巴馬 (Naazneen Barma) 和伊利·拉特納 (Ely Ratner) 就認為，「通過一系列的雙邊和多邊安排，中國政府已開始建立一種以反自由原則為基石的國際機制，以取代原有架構」，「沒有什麼地方比在非洲能更清楚地看到這種趨勢了。」他們主張，「中國的反自由主義構成了真正的、長期的地緣政治挑戰：它易於輸出，對原本就心懷不滿的國家可謂致命誘惑。」此外，他們還認為中國利用其「在國際體系中的重商主義力量」為自身攫取國家利益，以此為據把中國政治上的反自由主義與其對外經濟關係聯繫起來。³⁵

更加「鷹派」的批評者，諸如彼得·布魯克斯 (Peter Brookes) 和申智慧 (Ji-Hye Shin) 等，把西方國家的發展援助與自由主義連繫起來，把中國在非洲的商業競爭描述成零和博弈，將無可避免地威脅到自由主義和西方的優勢地位。他們認為，「中國透過支持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壓迫，抗衡來自傳統歐美夥伴給非洲的自由化影響」。³⁶

將西方與自由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學者通常認為，中國與非洲發展經濟關係的結果就是使非洲不再受傳統發展機構的影響，包括西方國家的發展援助機構 (如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和英國國際發展部) 和國際多邊發展援助機構 (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例如，普林斯頓·萊曼 (Princeton Lyman) 在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時指出，中國在非洲的經濟介入「沒有附加諸如改善治理、財政自律或其他西方國家給予援助時開出的條件」。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在 2008 年 6 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呼應了上述觀點：

中國的營商模式破壞了當地改善治理的努力，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推動的宏觀經濟改革。其中尤以樂於行賄為禍最烈，「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提供的材料可以佐證。³⁷

著名學者丹尼斯·塔爾 (Denis M. Tull) 和伊恩·泰勒 (Ian Taylor) 提出，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濟關係的確含有政治不自由的成分，但很難說這是中國無心還是有意為之。他們認為，「很難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大舉重返非洲就一定會導致負面的政治發展，認定『幾乎肯定不會對這塊大陸的和平、繁榮和民主有任何貢獻』。」³⁸ 克里斯·奧爾登 (Chris Alden) 在 2007 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在非洲》(*China in Africa*) 的「反自由的政權」章節中，解釋為什麼他相信中國對非洲資源類大宗商品的需求必然強化其與專制政權做生意的趨勢：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些經濟大多和非洲精英階層的利益密切相連。在這些國家的資源行業快速投資，所面臨的障礙比起在一個制度健全、信守憲法的國家要少。³⁹

2010 年，埃里克·基斯 (Eric Kiss) 和周曉 (Kate Zhou) 指出，中國「對腐朽野蠻的新世襲體制的默許，正在 (非洲) 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⁴⁰

一個宏大的視野

本書採用「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 approach)來審視中非關係的特徵與含意。第1章中我們回溯中非關係的歷史，其後五章分別考察中非關係中的五個具體議題：政治、貿易、投資與對外援助、軍事、媒體與社會關係。結論則基於我們的研究作出展望。

在即將展開的第1章，我們力圖呈現對中非關係史最廣泛、最全面的考察。對於中國與整個非洲大陸、各地區和特定國家間的關係，都分別窮本溯源探究，並將之置於關係史的整個發展鏈條討論。我們討論中非關係的歷史起點甚至遠至鄭和下西洋航至東非之前，年代分野包括以前被忽視的清朝時期，1949之前的民國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非洲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當代新興的經濟與政治夥伴關係。

在回溯政治關係的一章，內容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非洲國家外交承認，中國共產黨運用「人民團體」發展同非洲的政治關係，以及1977年後建立正式的黨際政治關係。本章還按程度和性質考察中國同非洲國家廣泛的政治和軍事關係，包括從早期的對解放運動提供武器，到現在的軍備轉讓、訓練軍隊和高層軍事交流。

接下來的幾章，我們分別考察中國對非洲國家的貿易、投資和援助。在審視投資和援助的歷史發展過程後，我們強調了要精確量度它們的困難。中國已經是非洲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對非洲國家的消費品進口和資源產品出口而言，但非洲仍然只在中國的全球貿易中佔據很小份額。因此，我們收集整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的數據，首次發布涵蓋1938年以及從1948年至2010年間的中非貿易數據集。我們還討論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中非教育和職業培訓、文化與語言交流、孔子學院、在

非洲的華人社區以及在中國的非洲人社區等範圍廣泛的諸多話題。我們相信，人際交流的擴展，特別是精英層面關係的發展，為未來幾十年的中非長期合作奠定基礎。在第7章結論部分，我們並不局限於對過去和當前問題的分析，而是放眼於今後中非關係走向的某些大趨勢。隨着雙方關係漸趨成熟，未來將如何發展？會有哪些機遇與問題出現？這部分包括關於中非關係的八個遠景展望，均以全書提供的事實材料和分析為依據。總而言之，本書力圖從最為寬廣的視野來展示中非關係在過去百年的歷史延續和變化。

註釋

1. 譯者註：于子橋教授是于右任的後人，曾任伊利諾斯大學東亞與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非洲問題研究，特別專注於中國對非政策。他於1981年訪問中國大陸，並於1984年率領美國非洲學家代表團再次訪問中國，開啓了中美非洲研究學者間的交流。布魯斯·拉金教授長期在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政治學系任教，早在1971年即出版了關於中非關係的著作 *China and Af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阿拉巴·奧貢桑沃是尼日利亞外交官、學者，1974年出版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71*。
2. 所訪問的非洲國家包括安哥拉、埃及、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利比里亞、尼日利亞、南非、蘇丹和斯威士蘭。到訪中國城市有北京、廣州、杭州、香港、金華、南京、青島和上海。
3. 公元1405-1433年間，鄭和率艦隊七次遠洋航行，最遠到達東非。
4. “Country Comparison: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010 est.,” CIA World Factbook official website.
5. 譯者註：中國與非洲國家合作建立「經貿合作區」的倡議，始於2006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在今後三年內，在非洲地區建設三至五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2007年2月4日贊比亞—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正式揭牌，是為中非之間首個經貿合作區。2019年底，由中國投資主體在非洲設立並通過商務部確認考核的合作區共有四個。
6. 譯者註：根據「國家漢辦」官方網站，截至2019年6月共有59所孔子學院遍佈非洲44個國家，另有附設在中小學的「孔子課堂」41個。
7. “Africa: China-Africa—an Economic Partnership,” FOCAC official website, 14 Sept 2010; Kenneth King, “China-Africa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or One-Way?” *Pambazuka News* 497, 23 Sept 2009.

8. 譯者註：到2013年11月，岡比亞宣布與台灣斷交，但該國直到2016年3月才與北京恢復中斷了21年的外交關係，當時民進黨的蔡英文已當選台灣總統，還有兩個月便上任。
9. 譯者註：按現有文獻披露，江澤民最早在1996年7月的一次工作視察時提出「走出去」的說法，當時他剛結束對非洲六國的訪問回國。在1997年12月24日的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上，江澤民首次把「走出去」作為重要戰略提出來，並置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2000年1月20日，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將「抓緊實施『走出去』戰略作為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抓緊解決的七個重大問題之一」提出。2002年11月8日，江在中共「十六大」發表的政治報告，稱「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
10. 譯者註：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64年1月訪問埃塞俄比亞，並與海爾·塞拉西國王會面，但兩國在1970年11月才正式建交。海爾·塞拉西在1974年國內政變後下台。
11. 譯者註：聯合民族獨立黨（民獨黨）於1959年5月成立，1964年10月24日贊比亞獨立時，由該黨領袖卡翁達任首任總統。1973年卡翁達取消多黨制，實行由民獨黨執政的「一黨民主制」。1990年贊比亞恢復多黨制，1991年全國大選結束了民獨黨長達27年的執政黨地位，此後至2019年該黨一直在野。贊比亞是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南部非洲國家，獨立第二天即宣布與中國建交，1964年10月29日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民獨黨執政期間一直擔任總統的卡翁達稱中國為「可信賴的全天候朋友」。
12. 譯者註：「多黨民主運動」在1991年至2011年執政，「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在2011年9月至2019年執政。中國外交部在官網稱：「多黨民主運動於1991年執政後，中贊關係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愛國陣線上台執政後，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繼續穩步發展。」
13.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14. 在1978年以前，中國的外交政策幾乎就是中國在第三世界角色的同義詞，中非關係在中國外交得到相當的重視。參見G. W. Choudhury, *China in World Affairs: The Foreign Policy of PRC since 1970*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2); King C. Chen,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Miami: East West WHO, 1972); Michael B. Yahuda, *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London: Croom Helm, 1978). 關於專門針對中國與第三世界關係的研究，參見W. A. C. Adie, "China, Russia and the Third World," *China Quarterly* 11 (July–September 1962): 200–213; Wolfgang Bartke, *China's Economic Aid* (London: Hurst, 1975); Janos Horvath, *Chines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Third World: A Grants Economy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1976); Alvin Z. Rubinstein, ed., *Soviet and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Praeger, 1975); Charles Neuhauser,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957–196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hen-Yu Dai, *China,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Third World*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4); Udo Weiss,

- “China’s Aid to and Trade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the Third World,” in Centre d’Étude du Sud-Est Asiatique et de l’Extrême-Orient, *China and the Current Era of Détente* (Brussel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1974); George T. Yu,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Asian Survey*, 11 (1977): 1036–48.
15. 這些專著分別是 Sven Hamrell and Carl Gosta Widstrand, eds., *The Soviet Bloc, China and Africa* (Uppsala: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1964); John C. Cooley, *East Wind over Africa: Red China’s African Offensive* (New York: Walker, 1965); Emmanuel John Hevi, *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3); Emmanuel John Hevi, *The Dragon’s Embrac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6).
 16. 1974 至 1976 年間出版的關於中非關係的著作包括：Alan Hutchison,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75); George T. Yu, *China’s Africa Policy: A Study of Tanzania* (New York: Praeger, 1975); 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19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Martin Bailey, *Freedom Railway: China and the Tanzania-Zambia Link* (London: Rex Collings, 1976); Richard Hall and Hugh Peyman, *The Great Uhuru Railway: China’s Showpiece in Afric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76). 在 1970 年代，這個領域內至少還有另外三本著作：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Richard Lowenthal, *Model or Ally: The Communist Power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Warren Weinstein, ed., *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1980).
 17. Cecil Johnson, *Communist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1959–196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Yitzhak Sc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Leo Suryadinata,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8); Robert G. Sutt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7*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8); Melvin Gurtov,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Joseph Camilleri, *Southeast Asia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5); James C. Hsiung, *Beyond China’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 for the U.S. and Its Asian Allies* (New York: Praeger, 1985).
 18. 譯者註：有西方輿論認為，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慣例、一意孤行支持非洲的一些「流氓國家」，從而破壞了以發展援助促進善治的目標。這個詞語最早由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雜誌主編摩奈姆 (Moisés Naím) 提出，他在 2007 年 2 月 15 日於《紐約時報》發文，形容中國對非洲的金錢援助是「流氓捐助」(rogue aid)。
 19.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1997);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0);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5).
20. 關於「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t)觀點, 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Aaron L. Friedberg, "The Struggle for the Mastery of Asia," *Commentary*, November 2000;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3/94); Ashley Tellis, "A Grand Chessboard,"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21. 關於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和對開放政策的持續依賴, 參見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關於社會的脆弱性和不安定, 參見Murray Scot Tanner, "China Rethinks Unrest,"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4). 關於經濟與社會脆弱性如何限制其行動能力, 參見Phillip C. Saunders and Erica Strecker Downs,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8-1999). 與這個因果關係多少有點矛盾的審慎樂觀觀點, 出現在這篇文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2003).
 22. Evan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 Take Off,"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David Sharr, "China's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4/2005); 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China Journal*, January 2001; 要了解更多描述, 可參見諸如: Jane Perlez, "The Charm from Beijing: China Strives to Keep Its Backyard Tranquil," *New York Times*, 8 October 2003; Amitav Acharya,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8-9 November 2003; Philip Pan, "China's Improving Image Challenges U.S. in Asia," *Washington Post*, 15 November 2003.
 23. 譯者註: 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 (NEPAD) 是2001年7月在贊比亞首都盧薩卡召開的第37屆非洲統一組織 (OAU) 首腦會議上一致通過的, 2002年獲接替「非統」組織新成立的非洲聯盟批准接受。該計劃的目標是減貧、促進可持續發展、阻止非洲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邊緣化、提高婦女地位、推動非洲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計劃內容主要包括六大板塊: 農業與糧食安全、氣候變化與自然資源管理、基礎設施與區域互聯互通、人力資源培育、經濟發展與公司治理、跨領域問題等。非洲之外的主要國際夥伴有英國國際發展部、德國國際合作機構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24.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18 June 2004), pp. 3-4.
 25. *Ibid.*, p. 4.
 26. Alain Gresh, "Understand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Le Monde Diplomatique*, 3 November 2008.

27.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07.
28. *Ibid.*, p. 311–12.
29. 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 in Dorothy-Grace Guerrero and Firoze Manji, eds.,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and the South: A Search for a New Perspective* (Oxford and Bangkok: Fahumu an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 113.
30. Jing Men, “China and Africa: Old Friends, New Partners,” in Dennis Hickey and Baogang Guo, eds., *Danc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p. 139.
31. 沙伯力 (Barry Sautman), 個人訪談, 2007年12月12日。此說起源可追溯至「依附論」(dependency theory)。參見Patrick J. McGowan,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Black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4, 1 (March 1976); Michael B. Dolan and Brian W. Tomlin, “First World Third World Linkages: Extern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 1 (Winter 1980); James A. Caporaso, “Dependence, Dependency,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System: A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1 (1978).
32. 在非洲, 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有: 阿里·阿卜杜拉·阿里 (Ali Abdulla Ali) (蘇丹喀土穆大學, Khartoum University)、瓦里斯·奧耶錫納·阿里 (Waris Oyesina Ali) (尼日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所, Niger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薩努沙·奈度 (Sanusha Naidu) (南非人文科學研究理事會,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伊麗莎白·西迪羅普洛斯 (Elizabeth Sidiropoulos) (南非國際問題研究所,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和加思·謝爾頓 (Garth Shelton) (南非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中國的知名非洲問題專家有: 賀文萍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安山 (北京大學)、劉鴻武 (浙江師範大學)、王洪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王鶯鶯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徐偉忠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楊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楊麗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33. “President Hu to Visit Africa to Consolidate Friendship,” *China Daily*, 4 February 2009. 這是中國政府官員造訪非洲時總愛用的一套說辭。2004年9月胡錦濤接見訪華的加蓬總統邦戈時強調, 「中國珍視中非傳統友誼, 堅定支持非洲的發展與振興。」參見中國外交部網站, 2004年9月9日。另參見Liu Guijin, “A Peacefully Rising China, New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 in Garth Le Pere, ed., *China in Africa: Mercantilist Predator, or Partner in Development?*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7), p. 16; Sautman and Yan, p. 90–91.
34. “Hu Jintao Meets with Gabonese President, Comoros President and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Chairman”, 中國外交部網站, 2006年11月1日。
35. Naazneen Barma and Ely Ratner, “China’s Illiberal Challenge,” *Democracy: A Journal of Ideas* 2 (Fall 2006): 57, 61, 63–64.

36. Peter Brookes and Ji Hye Shin, “Backgrounder #1916,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Heritage Foundation, 22 February 200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bgl/916.cfm>.
37. Stephanie Hanson, “Backgrounder: China, Africa, and Oil”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6 June 2008).
38. Denis M. Tull,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44, 3 (2006): 476. 另參見 Ian Taylor, “The ‘All’ Weather Friend? Sino-African Interac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Ian Taylor and Paul Williams, eds., *Afric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ternal Involvement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99.
39. Chris Alden,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Zed Books, 2007), p. 70.
40. Eric Kiss and Kate Zhou, “China’s New Burden in Africa,” in Hickey and Guo, p. 156.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